教廷外長談「中梵建交」前景

本刊編輯室

教廷外長拉約洛（Giovanni Lajolo）總主教在二零零六年三月份分別接受了香港多所傳媒機構的訪問，暢談他對中梵建交前景的看法。本刊特別綜合他近一年來對中梵問題的回答，總結成篇。

在談到陳日君樞機的角色有什麼重要性時，拉約洛（Giovanni Lajolo）總主教表示，陳樞機是天主教香港教區的主教，大家絕不可忽略他的重要性。香港的天主教會由接近三十五萬信友、約三百位神父、三百一十六所教育機構和一百一十一間慈善組織組成；它是活躍的團體，每年有超過三千七百人領洗，也有很多男青年準備領受鐸職。香港主教在天主教會內的角色的重要性，亦與該城市的重要性有關。教宗本篤十六世任命香港主教爲樞機，就是肯定崇高的偉大中華傳統文化與智慧，以及現代化中國在現代社會的角色，並顯示他對全體中國人民懷有特別的情感。他愛他們，因爲他們的勤奮和智慧等美德都是衆所周知的，他又敬佩他們偉大的文化歷史以及近年日新又新的創造力。

拉約洛總主教指出，中國的天主教會在內部合一的問題上受苦，這見於信友和司鐸跟他們的主教

之間的關係，以及主教們之間的關係。因爲教會發現自己面對著雙重的忠誠問題。一方面，他們忠於伯多祿宗徒的繼任人，因爲基督親自立伯多祿爲教會的元首；因此，如果不與教宗共融也不能算是天主教徒。必須強調，凡是中國天主教徒，不能爲了任何原因而願意放棄這份忠誠，因爲這是他們的信仰的結構。另一方面，中國教徒又有對國家政權的忠誠，因爲政府擔心天主教徒與教宗的關係會使他們從屬於外國勢力。他強調，中國天主教徒不因爲自己是天主教徒而感覺不是中國人，這與世界各地的信徒同樣。現在，如果教廷與北京政府之間能建立穩定、開放和信任的關係，這些緊張狀況必會克服，任何含糊的地方也可澄清。

對於中梵外交關係的發展，台灣和香港所扮演的角色問題上，拉約洛總主教認爲，正如國際社會一樣，教廷也視台灣是中華民族的一部份，正如香港是中華民族的一部份。它們是同一大中華的兩個重要的實體，各自擁有本身的歷史和個別的面貌，但二者都是典型的中國人社會。台灣的天主教會也是生活的團體，有七個教區，約三十萬信友。天主教會與台北政府之間的關係，是積極的和富建設性的，而教廷當然無意削弱它與當地信友之間的友好關係，或與台灣全體華人之間的密切關係。另一方面，教廷必須照顧那些最需要幫助的人的精神需要：今天，與台灣天主教徒比較，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有數百萬天主教徒更需要教廷的特別幫助。因此，教廷已展現它願意將大使館從台北遷往北京，正如一九五二年，鑑於當時的形勢，把大使館從中國大陸遷往台灣一樣。北京政府，以及台北政府，都意識到這一點，因爲教廷關注要以同一聲音向兩個政府講話。

早在二零零五年六月，拉約洛總主教訪問亞洲期間，就中梵關係正常化的可能性發表積極的聲明，表示沒有問題是不能克服的——但需要智慧，而且需要研究必要的先決條件。基本條件仍是宗教自由。拉約洛總主教當時說：「本人深信，如果雙

方懷著善意，並基於友誼的精神，我們可以達成積極的結果。」他指出，教廷顯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從實際意義上是一個主權國，不可能忽視中國有十三億人口，也不可能忘記中國文化對世界的影響。不過，拉約洛總主教強調，承認一個國家及其政府，跟正式的外交關係是有所分別的

但是，當談到中梵建交的時間表，拉約洛總主教表示，在這事情上教廷不可能單方面在未得北京政府的同意下行動。事實上，外交關係就是雙邊關係。如衆所週知，雙方一直存在各種接觸。他認爲，教廷一向清楚表達所要求的是什麼，以及在什麼事上準備做讓步，教廷也闡明了爲忠於自己本身所需堅持的事物。在他看來，時間已經成熟，相信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具有開放的精神，因爲他們不能無視本國人民的期待以及時代的徵兆。

對於陳樞機的個人風格與中梵建交的關係，總主教認爲，陳樞機是中國人；他愛他的人民，也明白他們。任命他爲樞機，這當然肯定了他的道德聲望，而相信他與北京中央政府的關係將有益於政府與教會之間互相了解。他不認爲任何人可以指責陳主教違反憲法或現有的法例。北京和國際社會給予香港特殊的地位。陳主教參與公衆事務，正好是尊重香港這特殊地位，按照民主的原則和對社會正義的支持，這並不意味著陳主教干預國家的立法行動，或者操縱公民的良心。

對於中國國內，官方天主教愛國會控制著教會的行政，有人認爲這等同分裂，拉約洛總主教卻指出，《法典》包含一些原則，規定天主教會內各團體的組成，以及在進行教會牧民活動時履行正確的行政程序。在中國，種種不利的環境導致出現與《法典》不一致，甚至違反《法典》的行爲。然而，這不一定意味著分裂：分裂是完全地和固執地拒絕教宗的權威。在中國，宣認自己是天主教徒者，有屬於天主教會不同組織的，都想與教宗共融，並想更深入地和積極地與他聯合。

談及在中梵建交談判的過程中羅馬教廷的訴

求時，拉約洛總主教又表示，教會的建立，明確地是爲了她與伯多祿繼承人的關係，因爲基督把履行治理、教導和聖化的三項職務，交託給伯多祿。這使命沒有取代主教作爲宗徒的繼承人的使命，因爲他們同樣是基督所願意的，也是必需的。教宗的使命和主教們的使命是按教會法典指示的形式而得以協調的規定。首個懸而未決的問題，正是尊重天主教會基本憲法的問題；國家當局必須考慮這一點。

對於中國傳來的有矛盾的標記，教廷所得的印象是，最高當局有調整關係的意向，但在中層有「阻礙」的人。台灣和北京都清楚知道教廷就外交關係問題上的立場，是可以解決的。宗教自由當然是基本人權：它觸及一個人最重要和親密的關係，也就是與天主的關係；它不可受任何執政者的約束。

有人問及所謂「越南模式」時，拉約洛總主教間接否定了「越南模式」存在。他指出，每個國家有自己的特色。人們所稱的「越南模式」是暫時性的，教會期望處境的改善。至於中國，教廷設法了解每個人身處的狀況。教廷渴望在中國的主教、司鐸和信友當中，重建完全的和完整的合一，以及相互的和誠懇的弟兄友愛。本篤十六世的首份通諭，就是以「天主是愛」爲題，邀請信衆接納我們當中的天主是「愛」，並因而接近其他人。基督提出的眞福八端之一指出：「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爲他們要稱爲天主的子女。」這也是教廷在中國各階層的「和好」精神的特徵。

拉約洛總主教又肯定教宗本篤十六世十分渴望訪問中國，向那裡的主教、神父和信友顯示父親般的愛護，因爲他們忠於伯多祿的繼承人並繼續作見證。此外，教宗也希望顯示他對偉大的中華民族的眞誠敬意。誠然，教宗的國際訪問日程表已安排得滿滿的，而且他已年紀不輕。儘管這樣，相信他仍會毫不猶豫地前往北京。然而，首先該當客觀環境許可，並且得到政府當局的邀請才可以成事。□